

經史避名彙考

上

徐傳武 胡真 校點

上海古籍出版社

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專刊

上海古籍出版社

經史避名彙考

上

徐傳武 胡真 校點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經史避名彙考 / (清)周广業著; 徐傳武, 胡真校
點.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 12
(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專刊)
ISBN 978-7-5325-7682-1

I. ①經… II. ①周… ②徐… ③胡… III. ①避諱—
研究—中國—清代 IV. ①K892. 98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5)第 140715 號

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專刊

經史避名彙考

(全二冊)

[清]周广業 著

徐傳武 胡真 校點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 網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網網址: www.ewen.co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經銷

江陰金馬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890 × 1240 1/32 印張 40.25 插頁 10 字數 1,080,000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5-7682-1

G·613 定價: 198.00 元

如有質量問題,請與承印公司聯繫

本書出版得到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專項經費資助

本書係山東大學基本科研業務費資助項目

《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專刊》出版說明

山東大學素以人文學科見長。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以聞一多、梁實秋、楊振聲、老舍、沈從文、洪深等爲代表的著名作家、學者，在這裏曾譜寫過輝煌的篇章。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來，以馮沅君、陸侃如、高亨、蕭滌非、殷孟倫、殷煥先爲代表的中國古典文學、漢語言文字學研究，以丁山、鄭鶴聲、黃雲眉、張維華、楊向奎、童書業、王仲犛、趙儷生爲代表的中國古代史研究，將山東大學的人文學術地位推向巔峰。但是，隨着時代的深刻變遷，和國內其他重點高校一樣，山東大學的文史研究也面臨着尖銳挑戰。如何重振昔日的輝煌，是山東大學領導和師生的共同課題。「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院正是在這一特殊歷史背景下成立的，她肩負着不可推卸的歷史責任，將形成山東大學文史學科一個新的增長點。文史哲研究院是一個專門從事基礎研究的學術機構，所含專業有中國古典文獻學、中國古代文學、漢語言文字學、史學理論與史學史、中國古代史、科技哲學、文藝學、民俗學、中國民間文學等。主要從事科研工作，同時培養碩士、博士研究生。知名學者蔣維崧、王紹曾、吉常宏、董治安等在本院工作，成爲各領域的學科帶頭人。

興滅業、繼絕學、鑄新知，是本院基本的科研方針；重點扶持高精尖科研項目，優先資助相關成果的出版，是本院工作的重中之重。《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院專刊》正是爲實現上述目標而編輯的研究叢

書。感謝上海古籍出版社對出版本叢書的支持，歡迎海內外學友對我們進行批評和指導。

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院

二〇〇三年十月

【附記】

《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院專刊》在過去十年中已陸續編輯出版五輯十九種二十八冊，在海內外引起廣泛關注和好評。二〇二二年一月，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院（二〇〇二年成立）與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二〇一〇年成立）、山東大學儒學研究中心（二〇〇五年成立）、《文史哲》編輯部整合組建為新的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文史哲研究院』名稱同時使用），許嘉璐先生任院長，龐樸先生任學術委員會主任。目前全院共有教職工六十五人，在讀碩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二百五十八人，另有尼山學堂古典實驗班本科生兩屆四十七人，在研博士後二十三人，科研教學事業都有長足的發展。本院一如既往，以中國古典學術為主要研究範圍，其中尤以儒學研究為重點。鑒於新的格局，《專刊》名稱改為《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專刊》，在前五輯之後繼續編輯出版。歡迎海內外朋友提出寶貴意見。

二〇二三年十月

前言

周廣業（一七三〇—一七九八），字勤圃，一字勤補，號耕厓，浙江海寧人，北宋大儒周敦頤後裔。南宋末，周氏一支因戰亂遷至海寧（今屬浙江），此後或仕或隱，始終保持詩禮傳家本色。周廣業繼承了家學風範，自幼便顯現出極強的讀書欲望和領悟能力。在他十歲時，父親周璟病逝，上有孀母，下有幼弟，一家生活不得不在鄉黨親族的幫助下艱難維持。然而，周廣業並未因此放棄學業，年甫弱冠便考取了生員，同時開館授徒，補貼家用。

從二十二歲成爲秀才之後，直到乾隆四十八年（一七八三），五十四歲的周廣業才通過鄉試，成爲舉人。在那個年代雖算不上奇事，但至少說明周廣業通過科舉考試走向仕途的道路並不順利。這種塞翁失馬的經歷，無意間成就了周廣業，使他在治學著述的道路上走得風生水起，頗有建樹。當然，這除了得益於他個人的勤奮與天賦外，也有賴於當時社會的環境和風氣。乾嘉時代的江浙，安定富庶，文風熾盛，至今爲學界推崇的大師級學者，大多來自當時的江、浙、皖三地。周廣業青年時代便得鄉賢祝人齋（淦）、朱蒿庵（芹忠）等的指點與賞識，此後長達三十多年的游學生涯中，又始終苦讀不輟，廣交師友，討論學問，著書立說，終於成爲一方著名學者。究其原因，與那個時代社會普遍存有的對學術的敬意不無關係。當時如王西莊（鳴盛）、盧抱經（文弨）、吉渭厓（夢熊）、邵二雲（晉涵）等，或年輩更長，

或地位更高，但都能與周廣業訂為學問之交，互相尊重，平等地切磋交流，這無疑為周廣業這樣的布衣學者提供了極為良好的成長空間和環境。

鄉試之後，周廣業便北上入京（具體時間已不可考），準備謀職，結果又沒有通過。但這並不意味着他的北京之行一無所獲，反倒成為他一段至關重要的人生經歷。早在乾隆三十七年（一七七二），安徽學政曾上奏建言進行《永樂大典》的輯佚工作，不僅得到皇帝的支持，最後還演變成了修纂《四庫全書》的浩大工程。周廣業進京時，正是《四庫全書》工程的後期，第一份已於兩年前抄成。但四庫館的工作還未結束，仍需要不少專業校勘人才，本來就在學界為人所知的周廣業自然受到歡迎。京城的生活和四庫館的工作，給周廣業帶來了許多在家鄉無法得到的益處，諸如學殖深厚的師友、在全國學界的知名度、平時難得一見的公私藏書以及更為寬廣的學術視野。對一個長期勤學慎思的學者而言，如此良機可遇不可求。用周廣業族叔周春的話說，這段經歷使周廣業「見聞日益富，著作日益多，才名日益盛」（《蓬廬文鈔》序）。直到乾隆五十二年（一七八七）會試不第之後，周廣業纔辭別帝京，回到浙江。

嘉慶三年（一七九八）初，周廣業以六十九歲之齡因病逝世，在那個年代的學人中，也只能算中壽。即便如此，他還是留下了《孟子四考》、《文昌通紀》、《關帝徵信編》、《補注馬總意林》、《目治偶鈔》、《蓬廬文鈔》、《經史避名彙考》、《讀相臺五經隨筆》等二十餘種著作，堪稱著述等身，且內容多以考據為主，顯示出不凡的功底。在現實生活中，周廣業家境略顯貧寒，又半生科場蹭蹬，雖說優于學問，但終究與富貴無緣，這又注定了他如此多的著作不能悉數刊行，至今僅《孟子四考》、《蓬廬文鈔》、《四部寓眼錄》等一小部分有刻本，且多流傳不廣。而他諸多作品中體量最大、用力最勤的《經史

《避名彙考》也只有寫本、鈔本傳世。

《經史避名彙考》是周廣業生平最重要的著作。題目中的「避名」，是中國歷史上的一種文化現象，也常稱爲「避諱」，用現代民俗學的表述，應屬禁忌中的語言禁忌、稱謂禁忌。禁忌的定義是：關於神聖或不潔事物的約定俗成的禁制。在中國人的觀念中，尊者、長者的名是神聖的，不能隨便指稱，必須規避。直到現在，如非必需，中國人依然會注意避免直呼尊長之名，這就是此禁忌的遺痕。在其他文化中，這樣的做法很難被理解，西方人的生活中直呼父母之名是十分正常的，因爲他們認爲名就是被用來稱呼的，毫無迴避的理由。而漢文化在詞語解釋體系中，就將名和諱定爲同義詞，又將諱和忌定爲同義詞，也就是說，在漢文化中，名和禁忌在原始詞義上就是對應的。這個觀念最早可以上溯到周朝，《左傳》桓公六年：「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正義云：

自殷以往，未有諱法。諱始于周，周人尊神之故，爲之諱名，以此諱法，敬事明神，故言周人以諱事神。

這段自古讀書人都很熟悉的經書注解，透露了兩個信息：一是避名始于周朝，二是避名與神有關。但最初的避名究竟基于什麼樣的理由或觀念，與哪些神有着何等關係，諸如此類根源性的問題在現存的文獻中已經很難找到明確答案了。可以肯定的是，後來的中國社會長期地、完整地保留了避名的做法，且認真地執行着。然而，歸根結蒂，避名是一種語言現象，離開語言便無所謂避名，要研究避名也必須依賴語言素材。

我國歷史上被保留至今的語言素材是十分豐富的，但由于衆所周知的技術手段原因，絕大部分時段

的素材都是文字形式，而語音素材幾乎爲零。加之中國歷史上書面語與口語並不一致，以文字形式真實反映口語形態的文本又十分稀少。於是，儘管避名是一種歷史上長期存在的語言現象，實際生發過的語言中，口語形式的量遠大于書面形式，但作爲後來的研究者，則不得不從以「經史」爲代表的大量古代文獻入手，將其中的關係盡可能梳理清楚。同時，由于時代的局限，更不可能要求周廣業這樣的清代學者在現代人纔有的理念和方法指導下，去探究避名現象的原始意義及其背後的社會學機理。

「經史」一詞，本是中國古代圖書四部分類法中前兩部的合稱，也常被用來泛指現存的各種古代典籍。在《經史避名彙考》的書名中，它取義于後者。在先秦到清末兩千多年的時間裏，避名一直存在于漢語世界中，後人可以觀察到的痕跡，則主要保留在歷久相傳的文獻中。這些痕跡大致可分兩類：一是相關的典章制度，二是各種相關案例。前一類可以是理論層面的分析討論，也可以是當時提出的對人們避名要求的具體約束規定；後一類可以是有關避名的故事實例，也可以是文本制作過程中實施避名要求的遺痕。這些內容零散地隱藏在浩瀚的古代文獻中，有些至今對我們的語言習慣產生着影響。要想對避名現象進行研究，首先要將這些原始素材找出來，並加以合理的排列和處理。周廣業做的，正是這樣的工作，因此稱爲「彙考」。

彙考是傳統文史類著述的一個名目，有彙集資料加以考證之義。前人以此名書者，如清人萬斯同的《歷代紀元彙考》、《歷代宰輔彙考》，近人諸祖耿的《戰國策集注彙考》等。其書的形態多近似史書中的志、表或子部的類書，通常以收集、排列相關資料爲主，間附案語以抒己意，重點在「彙」，而「考」的深度廣度，則視具體內容不同及作者用力大小而各有等差。因此，以現代人的眼光來看，也可以認爲

周廣業選擇了避名這樣一個史學或語言學課題，而《經史避名彙考》則是這個課題的最終成果。避名現象是古代讀書人日常都會遇到的，但兩千年來極少有人以此為課題進行研究，更沒有人做得很好，因此可以推想這個題目之難。而周廣業不僅憑着敏銳的學術嗅覺找到了這個空白，還以一己之力完成了這樣一部高質量的著作，這無疑是具有非凡意義的。

除了文史考據類課題普遍具有的難點之外，避名研究還有一些獨有的難處，非親歷其事者不易察覺。研究歷史上曾有的避名現象，首先要充分掌握現有的資料素材，這也是「彙」的根本目的所在。但如前所述，歷史上語言資料的保存本就是因为語音的缺失而損失過半，而少量的以書面形式保存的口語資料，涉及避名的又極為罕見。小說《紅樓夢》第二回中賈雨村曾提到：

我這女學生名叫黛玉，他讀書凡「敏」字他皆念作「密」字，寫字遇着「敏」字，亦減一二筆。

這是清代小說家虛構的人物和事件，反映的卻是當時讀書人避名的實情。林黛玉的母親叫賈敏，所以，對她來說，「敏」字是不可觸犯、必須迴避的，而具體的做法也躍然紙上。由于涉及口語，這樣有針對性的細致描摹的資料，對避名研究者來說非常可貴，可惜十分罕見，更多的都是古書中「缺一二筆」的避諱字而已。因此，史書中雖有「日對千客，不犯一人之諱」（《南史·王僧孺傳》）這樣的說法，但具體如何做，就不得而知了。

即使是面對文獻中的避諱素材，全面收集固非易事，更難的則在於甄別歸類。這個難點是由幾種不同因素合力形成的。首先，各種文本形成的時代不同，但具體的避諱行為卻是因時代和書寫者不同而迥異的，且不論個人化的家諱，即以天下共避的帝王名來說，也是有明顯時效的，漢朝人絕不會預避唐太

宗的「世民」，唐朝人也無需避漢武帝的「徹」，可謂兩不相干。在這個前提下，確認某個具體文本生成的年代就不再是簡單的一句話了。人們平時可以輕鬆地說《史記》是西漢司馬遷所撰，但在考察書中避名現象時，就不能這樣說，因為現在關心的是裏面某些字特定的用法或寫法，那就必須確定這文本實物生成的時代，而不是說它的內容或意思出自何人。同樣由于歷史上的技術限制，人們早就看不到司馬遷親手寫的《史記》是什麼樣子了，現在能見到的最早的宋本《史記》是出自宋朝人之手。印刷術是從宋朝開始大規模運用的，因此，由漢到宋的一千多年中，《史記》就是靠抄寫保存流傳的，誰也說不清現在看到的某一部《史記》從司馬遷寫好之後，經歷了如何複雜的轉抄、翻刻過程。自古以來，抄書的第一要義是不能抄錯，但異體字之類是不算錯的。另外還有一個習慣是邊抄邊糾錯，前人的避諱字顯然是「無用」的，甚至是會引起誤解的，當然要改，而且無需聲明，這樣的習慣直到今天的古籍整理出版依然保持，稱為迴改。這些抄錄翻刻的人，分別屬於不同的時代，自身面臨着各不相同的避名要求，故而又往往會加入許多新的避諱字。概言之就是三點：大量古書在流傳中沒有嚴格的字形規範，不影響表意即可；舊書中的避諱痕跡會因「過期作廢」而被後抄者改掉；各時代的抄寫者會加入當時的避諱字。因此，要考察漢代避諱的情形，《史記》固然是無可取代的好素材，但從這一百三十卷的大書中要找出避諱的痕跡就難了，更難的是，現存《史記》版本繁多，各有不同源流，其中的明顯避諱痕跡大多是晉唐以下直至其書本具體形成的時代生成的，而非漢諱。

《史記》如此，其他諸書也是一樣。所以，文獻中的素材決非簡單抽取羅列即可用于避諱研究，還要真正釐清其間種種繁複的關係，這需要大量比對、分析、推理、論證。這些工作之所以是需要做的，也是

可以做的，又取決于歷史上的避名行爲的一些基本規律性特點。對於一部比較大的書來說，後人抄寫翻刻是會進行迴改，但不見得能够悉數盡改，所以往往有跡可尋。既然是想改而遺漏的，其本身就可能帶有一定的隱蔽性，後人要發現它，也就常會有些難度。與之類似，在過去執行避名規則的時候，具體到一時一事，當避未避的事也很常見。因爲對於某一個人而言，很可能在成年之後遇到某位帝王登基，生活中便多了一兩個需避的字，但平時使用的慣性，很可能致使其偶爾忘記避諱。這種情況叫觸犯或觸諱。無意的觸犯時常會發生，所以古人雖然很講究避名，但也無意在法律規定上對觸犯之事加以過分的懲處。舉例來說，清朝是在正式文本中很講究避諱的朝代，《四庫全書》又是清朝傾力投入的皇家文化工程，所有抄寫工作責任落實到人，有嚴格的檢查和獎懲制度，應該說《四庫全書》中不可能存在觸諱的字了。但其實不然。在當時，康熙帝名中的「玄」要麼寫作缺筆的「玄」，要麼寫作「元」，乾隆帝名中的「弘」要麼寫作缺筆的「弘」，要麼寫作「宏」，不加處理照原樣寫便是觸犯。可如果仔細檢查，最初寫就的文淵閣本《四庫全書》中，《三國志·魏志·東夷傳》中便有一個「玄」，《宋書·王弘之傳》中便有一個「弘」，全書中「玄」、「弘」二字不下數十處之多，這都是在大量工作人員反覆嚴格核查之後遺留下的錯誤。那麼，其他時代一般抄本、刻本中的疏漏情況也就不難想見了。正因爲事實上有如此多的疏漏，後人還是有機會從已被改過不知多少次的古書中找到避名的痕跡，只是年代越早的痕跡越難以發現，而且只能用正面例子來舉證某時代或某人有何等避名行爲，不能用反例來證明其無此行爲。

歷代對避名的具體要求不同，甚至同一個人的操作都未必一致，面對兩千年來累積的資料所反映出的避名現象，後人只能感慨其隨意性太强，甚至直斥爲混亂。仍以帝諱而論，自古避名不避姓，但名有

單雙，為一個皇帝避幾個字便有不同，更有小名、舊名乃至謚號、年號歸為禁忌的字，如此已經不少了，加之還有嫌名一說，即將同音字也列入避忌的範圍，如按宋朝的官方定例，為皇帝名中的一個字動輒就有十幾個乃至幾十個字都列為禁忌，不免牽連過多。有的開國皇帝，太廟中的父祖輩根本没做過一天皇帝，其名也成為天下公諱，對文化的影響一點都不小于皇帝本人。除了要避的字數量多之外，規避方法的不一致更加可怕。一般來說，文本中要避一個字，大抵不外同義字替換、同音字替換、異形字替換、缺筆、空缺標注等手段。早期人們傾嚮于同義字替換，因為這樣做似乎可以在尋常使用中盡量避免歧義，但實際上這種做法對古代文本造成的混亂是最大的，因為除了正常表意之外，文獻中保存了大量專有名詞，比如人名、地名，這不是能用同義詞隨意替代的，因為漢代的幾個帝諱，孔子弟子中的漆雕啟變成了漆雕開，佷娥變成了媯娥，蒯徹變成了蒯通。漢明帝叫劉莊，「莊」經常被改為「嚴」，于是史上便有了「老嚴」的字樣，如果不是莊子實在太出名且只是在史書上出現過一兩次的话，很有可能至今人們還誤以為戰國時候有個哲人叫嚴周的。直到唐代，還有不少類似做法。後來人們漸漸發現這樣做的弊端，于是唐人又多用改字形的辦法，但唐人的繁瑣在于他們不僅改本字，還牽連了太多的漢字構字組件。比如「世」改成「云」的樣子，「民」改成「氏」的樣子，這做法不能在用單字的時候進行，便用于合體字中，就有了以「涂」當「渫」，以「緡」當「緡」這樣的大量異體字。最後，還是「少寫一兩筆」的缺筆字最安全，既做到了迴避，又不至于產生誤會，皆大歡喜。但是，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這些方式經常是混雜使用的，所以實際情況就十分複雜了。

凡此種種，都是《經史避名彙考》的難點所在，它們相互作用，又分散于浩瀚古籍的不同角落中，也

給全面研究者帶來老吏斷案、抽絲剥繭的樂趣。因此，四十六卷的書雖以抄錄舊籍爲主，周廣業前後卻花了三十年，直到臨終前還在修改校訂。

此書前三卷近似于卷首的作用，其中兩卷爲《原名》，收集禮書中所載古代命名規則，旁及二名、小名、字、謚等。一卷爲《序例》，總述歷代避名規則，卷末又附所知見歷代關於避名的專著，上起漢《汝南君諱議》，下至清陸費墀《帝王廟謚年諱譜》，要皆一二卷的短篇，間有錯謬不堪的劣作。

卷四至卷二十三，按時序羅列歷代帝王避名的相關資料，上起西周，下至明末，雖叛逆偏安政權亦所不遺。其體例爲：先列每帝姓名里貫、得國簡況及謚號、陵寢等。有追尊父祖令臣民避其名者，附于本帝之後。凡資料繁多者，則按內容分爲令式、人事、天文、地理等目，尤爲繁瑣者，再分設子目若干。避帝王之名，往往所涉時代地域甚廣，故有二十卷，幾占全書之半。

除帝王外，貴族官宦、平民釋道，均有避名之事載諸舊籍，家諱之類雖局限于很小的範圍，抑或僅是一時一事，但此類事例繁多，故亦有二十卷之巨。按名主身份不同，分爲《宮掖》二卷、《儲副》一卷、《藩封》二卷、《戚畹》一卷、《官僚》四卷、《宦寺》一卷、《親屬》五卷、《師友》二卷、《道釋》一卷、《閨閣》一卷。

最後三卷爲《神祠》、《遠服》、《雜諱》，屬避人名（按舊時觀念，蠻荒化外，以非人視之）資料之外的一些避名事實，近乎附錄。

世易時移，避名禁忌早已不再是生活中必須恪守的規矩，即便周廣業生活的清代中期，明代及以前的避名也與之全不相干。然而，文史研究的價值素不取決于其與現實生活的關聯度，前朝的兵制、賦稅、

官制、輿服乃至許多早已消失的活動、實物，無不能成爲學者潛心研究的對象，只因爲它們都是歷史長河中有機的一環，具有因小見大、管中窺豹的探究價值。

《經史避名彙考》這樣一個課題，首先可以直接應用於校勘、考古等與古代文本鑑識相關的領域，對於稍習文史者，這一點便無需贅述。因此，從魏晉六朝開始，就不斷有學者將避名的知識用於文史研究的實踐，但真正以之爲主題進行專題彙總分析的工作卻始終無人問津。周廣業提及的幾種著作，或是漢唐門閥制度背景下的實用手冊，或是明清兩代讀書人自製的速查表，都遠遠談不上深入研究。稍晚于周廣業的黃本驥曾作《避諱錄》五卷，也只是稍有增益，與周書相比，仍是燭火之微。民國柴立節有《說諱》，在形制上與周書十分接近，質量也較高，且一直寫到民國，可補周氏所闕，唯其體量較小，總不過數萬字而已。民國時陳垣先生著《史諱舉例》，確是真正有深度的另一相關著作，但此書雖以避名爲專題，其本旨卻在於課授從事校勘學的弟子，故爾全書均引古書中所見的避名案例，雖在實用化、科學化方面大有建設，卻又並非全面的避名專門研究。而且，在該書序言中，陳先生曾提及周廣業及其《經史避名彙考》：

其書迄未刊行，僅《蓬廬文鈔》存其叙例，甚爲可惜。

觀其辭氣，陳先生當未見其書。無獨有偶，一九五八年，張舜徽先生作《中國古代史籍校讀法》也承襲了陳先生之說：

惜其書沒有刊行，無由考見其中的豐富內容。

事實上，此書雖當時未刊，卻並非已佚。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續修四庫全書》第

八二七冊和書目文獻出版社的《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六七冊都影印了此書的同一鈔本。一九九九年，書目文獻出版社改名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又影印出版了此書的另一鈔本。從此，此書的內容漸爲人知，而且很快催生了一批以之爲工具進行避諱史研究的學者和專著，如王彥坤《歷代避諱字彙典》、王建《中國古代避諱史》、王新華《避諱研究》等。由此不難發現，在避名這一領域，周廣業之前並非無人涉足，只是成果還遠不能與之相提並論。周廣業去世後，《經史避名彙考》又因未能刊行而流傳不廣，陳垣先生這樣博聞廣見的大家也是只知其名而不見其書。而此書一經影印，又立刻受到學界廣泛歡迎，且隨之產生了許多相應的研究成果，這足以說明此書有着巨大的學術價值。

對一般的文史研究者和愛好者而言，避名確實是令人感到枯燥甚至厭惡的話題，今人每每以聲討的姿態去提及它，認爲這是「封建糟粕」，是擁有權力者無節制地自我膨脹，以至于自己的名用了一個字便不許旁人提及或書寫。其實這都不免有些想當然。雖然經史不能完整告訴我們避名現象形成的前因後果，但可知它是我們固有文化中一種表達敬意的習慣，是忠孝的一個組成部分和表現方式。用引經據典的理論可以說「見似目瞿，聞名心懼」（《禮記·雜記》）云云，但理論只有被儀式化的做法固定下來，才能真正爲人接受。我們已經失去了這樣的做法，當然與理論就有了隔膜，並視之爲蒼白無力的說辭。事實上，避名就是一個被中國主流社會長期認同的儀式化做法，這一點，和清明上墳、上巳修禊、男子蓄髮、婦女纏足之類並無不同，後人不能簡單地以其是否沿續至今而來判斷它的好壞對錯。與其他涉及全社會的規範一樣，避名肯定有副作用，主要體現在文獻傳承和日常語言的準確性上，它常常導致擅改古書和地名紊亂等問題，這在當時也是被視爲負面影響的。因此，到了明清，最高當局在頒布規章甚至在皇族